

一种关注

当老电影《牧马人》在今天凭借一句“老许，你要老婆不要”被推上热搜——

影视经典“翻红”，是巧合还是必然？

何天平

疫情期间，响应“少出门、多宅家”的防护号召，一段“特殊”的家庭生活催生出空前的影视文化需求。而在新剧停播、新综停录、院线撤档的非常态状况下，不少老剧、老电影则成为“合家欢”的主要娱乐：大多数电视平台、在线视频网站采取了重播、置顶推荐等方式重回经典，就连包括抖音等在内的短视频社交平台上也流转着大量经典“考古”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当然，这样的文化现象并非近期所独有。事实上，过去两年间活跃在大众视野中的影视经典不胜枚举，且传播对象体现出非常显著的年轻态特质。年轻人热衷于“往回看”，这构成了一个颇有意思的影视文化景观：曾经流行的经典再度化身为今天的流行，这些“未曾远去的美丽”或言重新被赋予时代意义的文化，我们应当如何来审视？

“回忆滤镜”背后，
是不言而喻的共情基础

“回忆滤镜”这个词，早已长大成人的80后、90后受众并不陌生。在越来越快的生存节奏里，有意识地“逃”回过去变成很多当代人一种有效的心理代偿机制。也是在如此情况下，回忆被覆上了一层又一层温柔的想象性地构造出了“生活在别处”的纾解通道。

处在转型期的社会，结构性地再现出这样的社会文化心理特点，也为其提供了整体性的现实依据：“回忆滤镜”的浩大声势并非无根之水，恰是深植于社会文化变迁脉络中的一种必然结果。而在可被大多数人所共享的集体记忆中，影视文化的痕迹又是最为浓墨重彩的——还有什么能比我们看过的电影、剧集、节目更足以充分阐述印记在一代人身上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认同和精神世界？

更重要的是，这种底色常谈常新。如同曾经流行过的喇叭裤、回力鞋在近年重回社会生活，国潮崛起之下的“复古”本身就代表了一种颇具后现代状况的流行文化。时尚界很早洞察到了这一点：奶奶辈的潮流今天也可以很时尚，这种时尚复古风潮被称作Granny Chic。就像是老式开衫、灯笼裤等成为T台新宠那般，那些活跃在数十年前的影视文化，今天看来也同样的不落时代的余光。

在B站、抖音等年轻人聚集的短视频平台，基于“回忆滤镜”的影视经典“翻红”层出不穷：有三十余年前的老电影《牧马人》凭借一句“老许，你要老婆不要”被推上热门，就连片中演员朱时茂都现身回应；有凭借鬼畜视频、表情包再度走红的“嘉靖海瑞CP”（《大明王朝1566》）、风流洪世贤（《回家的诱惑》）；也有通过剧情“考古”重新解构出得以沟通现实的新关联，如“反PUA斗士”陆依萍和“渣男”何书桓的人设重建（《情深缘浅》），再如凭借#刘星究竟有多有钱#（《家有儿女》）、#热捧柜教你人生道理#（《武林外传》）登上热搜，这些经典剧目引发众人乐此不疲地细抠台词、爬梳细节；还有以《我们的歌》为代表的“复古”音综，记忆中的华语金曲及其背后故事都被节目加以召唤，华语乐坛曾经的人声鼎沸和无数高光时刻重回现实。

去年底，有平台基于其经典专区上线以来的数据发布“90后沉迷看老片”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有上亿的用户人均追“经典”一小时以上，90后占比逾40%。在这些热门经典中，上述活跃在社交平台上的翻红剧亦有体现，观看行为和讨论热度之间得到互相确认，也侧面提示影视经典变成今天的流行文化已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的文化气候。

流行文化的生产，显然不止于在共时的意义上，其历时性的价值也有强劲的穿透力。尤其在互联网崛起的若干年里，人们进行文化消费的空间早已从匮乏走向过剩，这意味着并非新创造的文化产品就必然有足够的吸引力，大众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和经验来选择性接触更匹配自身需求的内容——在这个层面上，“已被验证过的经典”赋予新鲜的主旨意义，这既体现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共情基础，也释放了大众对“集体创作”的热情，业已外化成了一种明确的流行影视文化生产机制。

次生传播为流行影视
文化提供生长的全新土壤

当然，仅有社会文化的基础，要让经典“翻红”构成一种广泛的文化景观是远不具有充分性的。何况在这些重新走热的影视作品中，并不是所有作品都对应着这一世代的集体记忆。例如，以《牧马人》为代表的老片显然没有触及到主流年轻观众的成长记忆。

换言之，这种以“溯回”式的流行文化生产是体现复杂性的。“回忆滤镜”的背后，经典与现实所构成的对话空间无法仅用一种共通的情感机制来简单粗暴地加以解释。今天的媒介环境和传播变革势必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路径来确认“过去”与“当

下”的关联，从互联网的土壤里逐步壮大的次生传播，是值得关注的一种构造性力量。

罗兰·巴特有“作者已死”之论述，其认为“作者在完成作品的一瞬与作品的关系便宣告结束，解读权回归读者手中”。这个颇为结构主义的观点，明确了文本在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再生产机制。在影像的文化中，这一观点亦提示着文本编码和解码之间客观存在的极大发散空间，如巴特所言“每一次阅读即是一次新的写作”，文本的意义释出不仅来自于生产者的意志，同样体现着接受者具有能动性的解读。

互联网的文化则为这种能动性壮大了合理性，年轻人借此达成了一种自由表达的主张；其对于影视文本的接触，不再拘泥于“你播我看”的线性传播逻辑，而拥有了二次创作和传播的充分空间。上述“翻红”的影视经典实现破圈传播，无一例外地借力于诸种新媒体手段的运用，例如依托剧中人物（关系）生成的鬼畜视频和表情包、伴随式的弹幕讨论等，这些次生传播文本既是观众积极主动参与的再创作，也是受众解读空间的延拓，离散着元文本的母题意义，也生成了“过去”的文化表达与今天进行对话的现实条件。

进一步而言，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参与经典“翻红”的过程，本质上也透视出今天的“观看行为”所体现的意义流变：一方面是解构式的文化生产变成这个时代再现流行文化的一种主导性话语，这就不难理解人们从《情深缘浅》里再解读出的人物自省和自救的意味，又或是从《武林外传》中找到的入生箴言；另一方面，“看”这个动作本身也被赋予了更多其他意涵，例如伴随式的社交属性。人们渴望在抽离的虚拟交往中寻求一种共同记忆的经验，在弹幕里将齐妃与富察贵人（《甄嬛传》）的讨论调侃为“倒数第二教倒数第一如何成为学霸”，或是流传甚广的“雨女无瓜”（《巴啦啦小魔仙》）表情包引空前关注，作为社交货币的流行影视文化，在解构经典的次生传播中找到了生长的全新土壤。

经典再流行，优质影像内
容的影响力不会缺席

经典“翻红”，我们的市场能从中得到怎样的思考？

其一，当下部分影视生产面临产能与产质上的倒挂，经典的断代构成前提性的状况。相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影视文化屡屡创造的高光时刻，以及留下的无数耐人寻味的精品之作，今天的影视市场不免有着有些不尽如人意。大量涌现的新作不足以撑起一种共同的文化经验，甚至在审美期待和现实反馈的落差中人们局部性地表现出“宁愿循环一部老剧/老片无数遍也懒得打开一部新剧/新片”的心态，借由“回忆滤镜”的这一行为为添加的注脚，早已有别于若干年前的意义。这也意味着创作者完成前端的创作后，也理应重视后端的传播工作，提炼话题、借力短视频等新媒体文本，让用户作为一个全新的主体介入影视文化的意义生产，这不仅对经典“翻红”是有效的，对所有优质的作品都是锦上添花的。

其二，未来的流行影视文化，参与式生产势必会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关键力量，这不仅是变迁中的文化特点决定的，也是变迁中的传播环境决定的。观众的二次创作和次生传播充分体现着互联网的能动性，人们为“观看”这一行为所添加的注脚，早已有别于若干年前的意义。这也意味着创作者完成前端的创作后，也理应重视后端的传播工作，提炼话题、借力短视频等新媒体文本，让用户作为一个全新的主体介入影视文化的意义生产，这不仅对经典“翻红”是有效的，对所有优质的作品都是锦上添花的。

其三，播出平台的特质和传播路径，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参考要素。相比传统电视和院线作为播出端口体现出的“有限选择”特点，互联网去中心化、分化的传播路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内容传播和解读偏向。以《大明王朝1566》为例，这部经典电视剧在2007年的电视首播仅有不到0.5%的收视，社会声量和反响也平平，变成国剧历史中的一枚“遗珠”；而在十年后的视频网站重播中，B站的青年文化助推其光芒重现：上线三天播放量超1600万。如今再来谈论中国历史剧，更年轻的观众也不会忘记《大明王朝1566》是存于其中颇为闪光的经典一笔。

无论在经典“翻红”的意义上，或是新剧创作与传播的启示上，这三点都是值得继续推敲的；但无论如何变化，优质影像内容的影响力可能会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由丛珊、朱时茂等主演的电影《牧马人》剧照



▲新一代观众从《武林外传》里看到的是“佟掌柜教你人生道理”

经典重访

道德修养决定医治效果？

从小说看中国古人如何认知疾病

詹丹

近日，因新冠病毒肺炎爆发，其病毒源被追溯到野生动物，所以连《红楼梦》的吃野味和小说人物的得病问题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虽然从学者对《红楼梦》相关内容的梳理中，看不出小说写人吃野味和得病有什么关联，但由此也引发了我对另一个更普遍的关联性问题的思考。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关人的患病和医治方面的书写，常常不是一个纯粹的病理学或者医学治疗问题，而是跟人的道德修养问题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

早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言语”篇就提到，西晋有一小孩因父亲得疟疾，出门求药时，有人就很不友好地讽刺其父说：像这样道德高尚的君子（“明德君子”），何以也会患上这样的恶病？小孩反应很快，回答说：专门来祸害君子的，所以称为恶病呀！虽然这样的回答相当机智，堪称教科书式的，但细究起来，该儿童的回答，属于偷换概念，是把对君子的认定转换成了对疾病的认定问题。但小孩之所以不得不偷换概念，是因为他无法反驳当时社会的一个共识，即认为君子凭借自己的道德修养，是能够抵御疾病侵袭的。

随着因果报应思想深入人心，古时的人们已习惯于认为，个人的道德有亏不但会让疾病侵袭自身，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子嗣。反过来讲，凭借人的道德修养，也可以对疾病产生神效的治愈力量。当时的志怪小说《宣验记》中有一篇，就颇具代表性。小说写道：周国氏有三子，皆暗不能言。一日，有人来乞饮，闻之，声，问之，具以实对。客曰：“君有罪过，可还思之。”周异其言，知非常人。良久乃云：“都不忆有罪过。”客曰：“试更思幼时事。”入内，食顷，出曰：“记小时，当床有燕巢，中有三子，母还哺之，燕出取食，屋下举手得及；指内巢中，燕子亦出口承受。及取三菜羹，各与之吞，既皆死。母还，不见子，悲鸣而去，恒自悔。”客变为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便闻其言语周正，即不见道人。

这里，叙述周氏三个儿子天生哑疾的病因，完全是冥冥之神对周氏幼年时代杀生行

为的惩戒，而一旦周氏有了悔过之意，孩子的疾病无需医治，立马得以病愈。宗教道德原则虽然在小说里起着支配作用，但也不能忽视不同生命体所处认知结构的层次差异所发生的作用。由于燕子、周氏和道人分属于认知世界的三个不同层面，所以，周氏能轻而易举举蒙骗燕子吞下菜羹，却不能理解自己的三个儿子何以会得哑疾。只是当高于他认知的道人来启发他时，才把他的认知提到了新水平，并使他对自己的过去有了真诚的悔意。也就是说，只有周氏能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更深远后果时，燕子相对于人而言的认知局限就不再是一种局限，而人把自己的认知水平提到了得道之人的高度。小说表明了，所谓的三个层面的认知水平差异，实质上取决于中间层面的人的所作所为，由人的认知冲突而发展出的情节冲突，才构成了艺术的动人力量。

这样，小说提示笔下人物的行为有着他所无法预知的后果，让人对自然万物心存道德的敬畏，使得这篇具有了广泛的隐喻价值。

当然，即便这篇小小说的价值可以在隐喻层面得到理解，我们也不能忽视，其情节展开过程中存在的一种缺憾，即关于人的生命体的自然机制被基本略过，疾病问题完全与人的宗教道德关联起来，说明这样一种艺术视角，虽然超越生命体作用的更开阔思考，但恰恰因为这种超越对道德力量过于强调，忽略了对生命机制本身的书写，所以这样的超越性思考，还是过于简单和粗糙的，且不说其中的神秘色彩也会削弱道德的说服力。

相比之下，《红楼梦》有关医病的书写就更为全面而深入。原因一方面当然是洋洋百万字的篇幅，为展示人物的全景生活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对医病和道德的关联性认识得更为辩证了。

比如小说开始部分写贾瑞病死，这固然是因为受了王熙凤的屡次捉弄，导致风寒入骨，一病不起，但也跟其自身为人不知检点、不能节制欲望有直接关系。“风月宝鉴”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世人的道德修养起着劝诫作用。而接下来连续写秦可卿、秦钟的夭亡，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意思，特别是写

秦可卿与贾珍的行为，暗示他们间可能的道德乱伦，曾是红学界研究的一个专题。但直接或者间接暗示人的道德修养与疾病的关联性，仅仅是《红楼梦》书写的的一个方面，是作者对传统观念的一种顺应。更重要的是，作者还以另一副笔墨，对这种关联有意作了切割。

第二十一回写王熙凤的女儿大姐儿患上甚为凶险的痘疹（即出天花）。凤姐除了请大夫上门来日夜守候看护、用药调理以及在家人供奉痘疹娘娘外，还对家人进行了隔离，让贾琏搬到外书房住。这固然是因为痘疹有较强的传染性，通过对家人隔离，可以有效防止传染。但特别的作用是，让贾琏搬出去住，还是对男女主人的一种道德要求，从而与在家里供奉痘疹娘娘的虔诚态度相协调。问题是，随后的十几天里，王熙凤固然做到了这一点，但贾琏却无法做到。他与厨子的妻子多姑娘偷情幽会，而依照当时社会的主流态度，这显然是更加严重的道德不洁行为。

让人颇感惊讶的是，小说接下来写，贾琏这样的道德不洁行为，似乎并没有冒犯痘疹娘娘，更没有妨碍大姐儿的病愈，医治本身才是最见效果的。而贾琏虽然行事不谨慎，但被平儿掩藏了过去，没有让凤姐发现，最终使大家都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结局。于是，从这种隔离的实际效果书写中，我们发现了作者对道德影响力实施的那种“隔离”，就是把传统观念中认为道德是无处不在的影响力隔离在小说之外了。但这种隔离并不意味着作者一概否定道德或不道德对患病与医治的影响力，不然他不会那么地去写贾瑞之死，他更不是一概否定道德的积极效果。但至少在这一事件描写中，他肯定了借天意来实现道德的神秘力量。

需要补充的是，当后来长大的大姐儿遭遇人生困境，刘姥姥得知后，毫不犹豫地搭救她。因为王熙凤曾经对刘姥姥出手捉弄，终于让一种基于人际交往的道德行为发生了回馈效应，这种用人情交往来对天的道德因果神秘性加以重新设定，正是曹雪芹要比传统小说家更明慧的原因之一。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